

# 孙中山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黄 顺 力

民族意识是一种“理性的自觉”，也是一个不断修正并力求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历史过程。在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日趋加深，时代风云剧烈变幻的历史条件下，民族意识的觉醒曾经历了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因此，就严格意义而言，民族意识还应有“传统的”和“近代的”之分——前者基于共同的地域、血缘和文化所维系的纽结，表现出一种源远流长、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或可称之为族类意识；后者则因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国际交往的扩大，以及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刺激，而体现出一种强烈的、以争取民族独立富强、反对封建专制政治和振兴中华为核心的近代民族精神。

本文拟就辛亥革命时期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特点与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内在关联，以及民族意识中传统因素与近代成分交织对辛亥革命的进程与结果所造成的影响等问题，作一粗浅探讨。

—

清王朝的统治是满族贵族拉拢一部分汉族地主官僚共同镇压各族人民的反抗而建立起来的，当它还拥有强大的力量足以使用高压和怀柔的两手政策维持其统治地位的时候，因民族压迫和民族文化心理的差异而形成的民族矛盾，在时间的推移下会渐渐地包容于阶级矛盾之中。但包容毕竟不是消融，民族矛盾也不等于阶级矛盾，清王朝实行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政策的事实存在，以及由于地域、血缘、文化的共同性，加之长期的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在汉族人民头脑中所形成的传统民族意识，如“内诸夏而外夷狄”、“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非我族类，其心必异”<sup>①</sup>等等，仍潜移默化地在人们的头脑中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会使满汉之间潜在的民族矛盾及传统民族意识在特定的场合和条件下，寻找机会顽强地表现出来。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剧烈变动的中国社会与内外危机的激化，为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提供了场合和条件。在此期间，先是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及战后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严酷事实，给中国造成了空前的民族灾难。紧接着数年之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爆发，清政府又被迫与各列强国家签订《辛丑条约》，使中国完全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因此，就外部而言，中华民族已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

就内部来说，清朝封建统治在此一时期已加速进入垂暮之年，统治危机和社会危机也日益严重。中日甲午战败的奇耻大辱，刺激了维新变法运动持续高涨，随着变法改革被腰斩，人民群众自发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被镇压，以及自立军起义、拒俄运动等重大事件接踵而至，强烈地催发了人们对清王朝腐朽统治的反感情绪。一个汹涌澎湃的革命排满风潮遂铺天盖地而来。

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正是在上述多种危机的交相刺激下，伴随这股巨大的革命排满风潮而迅速复苏的。这种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把原来看待“外夷”的“夷夏大防”的传统观念，引申扩大到“异族”统治者满清王朝身上，激发了人们的反满民族意识。

清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其高明的统治手法之一,就在于极力推崇特别注重君臣之义、纲常名分的程朱理学,扯大旗作虎皮,以维护封建道德自居,来消弭满汉间传统“夷夏大防”的民族心理差异。基本上把华夷观念成功地转移到了外国人身上,从而确立起以清朝统治为中心的“大皇帝君临四海,四方蛮夷向化中朝”的一元世界观。

近代以后清政府腐朽统治和卖国行径的进一步暴露,给了爱国的人们以强烈刺激,引起他们的深刻反思。许多人认为,清朝政府本身就是一个“异族”的政府,满族贵族反对变法改革,不过是担心改革有利于汉人发展,而不利于满人统治;奉行所谓“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不过是“支那土地宁奉之他人,不甘返于汉族”<sup>⑧</sup>的潜台词罢了。因此,满汉之间的民族矛盾开始重新凸显出来,传统“夷夏大防”的民族意识自然依此也相伴而重生。1904年底留日学生创办的刊物《开智录》最先透露了这一信息:“我国人日言为外国奴隶之耻,而不知为满洲奴隶之耻;日言排外种,而不知排满洲之外种。满洲贼之盗我中华也,二百八十年于兹矣。”<sup>⑨</sup>公开翻出了清朝统治者以“外种”身份,“盗我中华”的历史陈案。不久,另一留日学生刊物《国民报》也以“汉种”、“汉土”为题来抨击“异族”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大大激发久已湮没不彰的传统“夷夏大防”意识。尤其是章太炎的《正仇满论》、《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等重要政论文章和著作发表后,更使“有知识者,知满汉二族利害关系,全然相反,欲求自存,非先除去满人不可。由是汉满种族之问题渐生,而排满之风潮起矣”<sup>⑩</sup>。

第二,引述历史典故,阐发“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春秋大义,以论证反满革命的必要性。

在这一点上,以章太炎的反满宣传最具代表性。例如1903年他发表著名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即以历史民族为线索,阐扬“内诸夏外夷狄”的春秋大义来激发人们的反满意识。在文中,章太炎以大量笔墨论证满族是“异种贱族,非吾中夏神明之胄”,认为历史上骆越、闽、广、五胡、代北等少数民族“皆归化汉人而非陵制汉人者也”,而满族的宗教、信仰、服饰、言语等与汉人不同,其“堂子妖神,非郊丘之教;辮发瓔珞,非弁冕之服;清书国语,非斯邈之丈”,反而陵制于汉人之上,这是汉人的奇耻大辱。此外,他还引用白起坑赵、项羽坑秦的历史典故,说明“秦、赵、白、项本非殊种,……故秦、赵之仇白、项,不过仇其一人”,而满洲“异种”入主中原,则“人人欲尽汉种而屠戮之”,因此,“汉族之仇满洲,则当仇其全部”<sup>⑪</sup>,号召人们驱逐异族,光复汉族的“正统统治”。

第三,强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以种族偏见的眼光来衡量事物的是非。

清政府的腐朽和卖国行径,加之其“异族”统治的身份,很自然地会触发人们对“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联想。孙中山曾指出:“凡国之所以能存者,必朝野一心,上下一德,方可图治。而满人则曰:变法维新,汉人之利,满人之害。又曰:宁赠之强邻,不愿失之家贼。是犹曰:支那土地宁奉之他人,不甘返于汉族也。满人之忌汉人之深如此矣,又何能期之同心协力以共济此时艰哉?!”<sup>⑫</sup>可见,这话中已隐寓了“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看法,但以这种种族偏见的眼光来衡量一切事物的是非,还是数章太炎的言论最为典型。在章太炎的心目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满人贪冒,本十倍于汉人,如彼康熙、乾隆二朝,名为法令修明之世,而黻货者犹遍于朝列。汉、唐、宋、明盛时,有此秽乱事耶?……独此满洲政府,自边外马贼组织成立,摸金成丘,是其天性,余波所衍,安得不至是乎?”<sup>⑬</sup>因此,他错误地认为:“满洲之乱政,非自法令成,自其天性与习惯成”<sup>⑭</sup>。在这种明显的种族偏见的引导下,章太炎的结论自然就是:“逆胡羶虏,非我族类,不能变法当革,能变法亦当革;不能救民当革,能救民亦当革。”<sup>⑮</sup>一句话,只要是满人“异族”当政,就要倡言排满、逐满,中原大地只能由汉人统治。“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sup>⑯</sup>无庸讳言,由于传统民族

意识复苏的影响,章太炎的思想认识和主张在当时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陶成章、吴越、胡汉民、汪精卫,包括朱执信、邹容、陈天华等人都有过类似的言论和主张。

辛亥革命时期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是内外多种危机急剧激化的产物,它催发了爱国人们,尤其是汉族知识分子中长期潜藏的“我同胞虽谨慎服从,而彼终以异族视我”<sup>①</sup>反满情绪,推动了整个革命排满风潮的高涨。但这种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民族意识本身却包含有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复仇主义的消极因素,由传统民族意识衍生出来的单纯反满思想无论如何也很难跳出旧时代的窠臼,而真正体现传统民族意识向近代民族意识转变、代表近代民族意识觉醒的是孙中山有关民族主义的思想 and 主张。

## 二

我们认为,考察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与近代民族意识是否开始真正觉醒,应有它的基本内容的规定性,这就是,一,它必须具有强烈的民族独立富强意识,以振兴中华为革命奋斗的基本目标;二,它应基本摆脱以种族为中心的传统族类意识的影响,确立比较正确的民族平等观;三,最重要也最关键的是它必须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有较清醒的认识,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突破单纯“反满”、“光复汉人政权”的狭隘观念。

首先,早在兴中会成立之初,孙中山就在该会章程中大声疾呼:“中国积弱,非一日矣!上则因循苟且,粉饰虚张;下则蒙昧无知,鲜能远虑。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更何况“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特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sup>②</sup>表现了一个真诚的爱国者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所怀有的忧患意识。正是鉴于这种民族危机的形势,孙中山明确提出创设“兴中会”的斗争宗旨在于一“集会众以兴中”、“奠我中夏”;二“振兴中华,维持国体”;三“伸民志而扶国宗。”<sup>③</sup>在近代中国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著名口号,并从此把这一战斗口号作为自己并带领他人终身革命奋斗的基本目标。

需要指出的是,兴中会章程中所说的“国体”、“国宗”,并非指清王朝的政权统治,而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实体存在,是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主权。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知道,孙中山在《章程》中已严厉抨击清政府“因循苟且,粉饰虚张”,认为中华民族屡受外国列强的欺凌,根子在于清政府“庸奴误国,荼毒苍生”<sup>④</sup>,才造成如今国家“一蹶不兴,如斯之极!”“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sup>⑤</sup>的严重后果。不久,香港兴中会总部成立,孙中山在章程中公开把斗争矛头指向清政府,斥其“乃以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哉!”<sup>⑥</sup>并在入会誓词中明确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sup>⑦</sup>作为兴中会的革命目标。可见,孙中山从立志发动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把清王朝看成他心目中的“国体”或“国宗”,而是怀着强烈的“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的历史责任感,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sup>⑧</sup>挽救民族危机,追求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振兴中华”的时代召唤,不仅激发了当时人们的近代民族意识,而且直至现在还是激励炎黄子孙爱国意识的最鼓舞人心的口号。

其次,民族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既有元末明初“驱逐胡虏”,太平天国“奉天讨胡”等传统族类意识的影响,更有他长期国外所受的近代西方教育的熏陶,具有“改良其缺点”的主客观条件。因此,兴中会成立后,在香港兴中会入会者誓词中改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加进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内容,从而显示出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与以往的农民起义

已有本质的不同。尽管在此时直至同盟会成立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孙中山仍然有诸如“满洲”乃“东北一游牧之野番贱种”<sup>⑧</sup>、“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sup>⑨</sup>,中国革命要“将满洲鞑子从我们的国土上驱逐出去”<sup>⑩</sup>等等偏狭之见,这说明了传统族类意识之潜移默化的影响力,但很明显,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斗争的深入,孙中山开始逐步摆脱这种传统意识的影响。同盟会成立之时,有人主张称“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则强调:“以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sup>⑪</sup>。1906年12月,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讲中,对反满问题作了更明确的阐述。他说:有些人对“驱除鞑虏”的理解有误会,以为“民族革命是尽灭满洲民族,这话大错。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满洲人灭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sup>⑫</sup>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孙中山严厉谴责了历史上曾发生过民族之间互相仇杀的做法,“攻城破了,还要大杀十日才肯封刀,这不是人类所为”,并明确表示今之反满革命,“我们决不如此!”<sup>⑬</sup>以避免重蹈民族仇杀的覆辙。

孙中山的思想主张对于纠正那些“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sup>⑭</sup>、“手提三尺剑,割尽满人头”<sup>⑮</sup>、“种族革命之志为复仇”<sup>⑯</sup>等错误偏激的仇满言论,无疑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可以说,清政府实际上是在排山倒海般的革命排满风潮中垮台的,但在此过程中并没有发生过严重的民族仇杀行为,说明孙中山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已有效地摆脱传统族类意识的消极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对传统族类意识的纠偏正反映了这种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

第三,孙中山始终把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在一起,反对清朝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要求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从而在当时所能达到的思想高度上体现了近代民族意识的真正觉醒。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这一点:其一,把反满的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奋斗目标始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基本特色。兴中会时期,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斗争口号,即明确把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作为兴中会的斗争宗旨,成为近代中国倡导革命排满的第一人。从这之后,孙中山就把他的反满主张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即创立合众政府的奋斗目标紧密地联系在一起。1903年秋,他在原有誓词的基础上,增改了新的内容,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作为东京军事训练班的誓词。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进一步把这十六字誓词作为革命宗旨写入《中国同盟会总章》。不久,又把这一具有纲领性的文字概括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三大主义”,成为辛亥革命的总纲领。正如他在同盟会《军政府宣言》中所强调指出的那样:“惟前代革命,如有明及太平天国,只以驱除光复自任,此外无所转移。我等今日与前代殊,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外,国体民生尚与民变革。”<sup>⑰</sup>其二,把反满的民族革命与反封建专制的政治革命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的精华。孙中山倡导革命排满之初,曾受“先民所遗留”的传统观念影响而不乏偏狭之见,但这并不足怪。作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在开始从事理论探索和政治实践时,都不免要受到既往历史所创造的物质生活条件和精神生活条件的制约,思想意识观念的承继和扬弃更是如此。但即使这样,孙中山与那些只“愤于种族偏见而反对满清的人”还是有实质性的区别的。在《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一文中,孙中山宣布“必须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的计划,经慎重考虑之后,早就制订出来了。”他还满怀信心地说:“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

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sup>②9</sup>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把革命排满的内在涵义阐述得很清楚。他说:“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照现在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sup>③0</sup>从而把推翻清朝反动统治民族革命,同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治革命紧密结合起来。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思想跳出了传统民族意识的框框,不仅把反满口号与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目标始终联系在一起,而且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正确地结合起来,形成了可贵的革命民族主义思想,大大地提高了人们的民族觉悟程度,也为辛亥革命运动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正确的政治方向。

### 三

辛亥革命时期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与近代民族意识的觉醒相伴而生、互相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这种既具传统因素,又含近代成份的民族意识在促使反满风潮更加汹涌澎湃的同时,也使得反满革命斗争显得更加错综复杂,并对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不可否认,传统民族意识作为千百年来汉族人民在长期的共同劳动和共同斗争中所积累沉淀下来的民族文化心理,不仅对汉民族的巩固和发展,增强汉民族的同根意识和凝聚力,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在晚清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传统民族意识的复苏也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整个革命排满风潮的兴起。1905年孙中山在一次演讲中曾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乃曾几何时,思想进步,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充布于各种社会之中,殆无不认革命为必要者。”<sup>③1</sup>这里所说的“民族主义大有一日千里之势”的年代,正是秦力山等创办《国民报》“大倡民族主义”<sup>③2</sup>、章太炎等人举行“支那亡国二百四十周年纪念会”,以及各种报刊杂志竞相发掘宣传汉族历史人物的事迹,促使传统民族意识迅速复苏之际。可见,传统民族意识的确能够有效地激发人们对清朝统治的愤懑情绪,使“排满之一主义,遂深入于四万万国民之骨髓中。”<sup>③3</sup>但与此同时,这种因传统观念的影响而造成的情绪化反应,又会模糊辛亥革命的斗争目标。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为了窃夺革命果实,与南方革命派发生了定都地点之争,章太炎积极支持袁世凯,反对孙中山,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他早就认为:“今之种族革命,若人人期于颠覆清廷而止,其后利害存亡,悉所不论,吾则顶礼膜拜于斯人矣。”<sup>③4</sup>况且,袁世凯又是汉人,革命派屈从其意,无所谓“投降”,“若知同一汉族,本无降顺之名,又安用诡辩为?”<sup>③5</sup>这种比较有代表性的错误言论,对辛亥革命的结局造成了极为不良的影响。

其次,传统民族意识强调“夷夏大防”,注重从历史典故中寻觅民族精神,推动反满革命,这在辛亥革命运动的初期有其历史的合理性。章太炎强调人们要学习历史,“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sup>③6</sup>,包括研治经学,也是“欲使人推导国性,识汉虏之别耳。”<sup>③7</sup>这种积极从历史典故经籍中寻觅民族精神的主张,作用就在于“其传布思想,则以不平之心、复仇之事导之,此最易发常人之感情也。”<sup>③8</sup>但是,传统民族意识中“夷夏大防”、“内诸夏外夷狄”、“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等观念,通过历史典故而加以重新阐扬,会使人们在新仇旧恨的愤激情绪驱使下,导向单纯的反满种族复仇主义。有人曾说:“当时三民主义旗下的人,大都是一民主义(即主张反满的民族主义),……这时候革命党所用的量尺,仅是以排满复仇主义作材料制造出来的。”<sup>③9</sup>很显然,由传统民族意识所激发出来的反满思想将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狭隘的大汉族主义和种族复

仇主义的消极因素。

当然,随着孙中山革命民族主义思想的宣传,并且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和接受,民族意识觉醒过程中传统因素与近代成份的比重也呈现出一种彼消此长的趋势。例如,早在1930年6月,章士钊在《读〈革命军〉》一文中就正确地指出:“仅仅以仇满为目的,而不灌输国民主义,则风潮所及,将使人人有自命秦政、朱元璋之志,而侥幸集事,自相奴畜,非酿成第二革命不止。”<sup>①②</sup>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纲领公布之后,有人著文对反满问题也发表了与孙中山类似的想法,文中写道:“满人非尽恶也。有革命思想、谋社会进步者固不乏,不可因其满人而一网打尽。”还说:“汉人非尽良也,助纣为虐、为桀作犬者,今日之当道皆是也,不可因其汉人而置之不问。”<sup>③</sup>还有人认为日后革命成功,必须坚持满汉平等政策,“满洲群族来归者,悉置不问,安置郡县视若汉民。”<sup>④</sup>

此外,辛亥革命后期虽仍有激烈的反满言论,但基本上没有激烈的仇满行为,从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看出孙中山民族主义思想对促进近代民族意识真正觉醒的实际作用。

至于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有关民族平等、反对列强压迫、积极参与世界竞争以求自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等后期民族主义思想的发展,及其与近代民族意识的确立,因已超出本文的范围,我们将另文加以探讨。

#### 注:

①② 阙民:《仇一姓不仇一族论》,《民报》第19号。

③ 《开智录》:《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转引自《清议报全篇》卷26,群报撷华,专论,第185页。

④ 陶成章:《浙案纪略》,《辛亥革命》(3)第15页。

⑤⑦⑧⑨⑩ 《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第201页;下册,第840—841页;上册,第423—424页;第171页;下册,第840页(中华书局1977年版)。

⑥ 逸仙:《支那保全分割合论》,《江苏》第6期,第17页。

⑦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378页;第115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⑧⑨⑩ 章太炎:《定复仇之是非》,《民报》,第16号。

⑪ 《国内时评·记事》,《江苏》第6期,第147页。

⑫⑬⑭⑮⑯ 孙中山:《兴中会章程》,《孙中山选集》,第14页。(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⑰ 《香港兴中会章程》,《孙中山全集》,第21页(中华书局,1981年版)。

⑱ 冯自由:《革命逸史》,第4集,第9页。

⑲ 冯自由:《革命逸史》,初集,第26页;第100页。

⑳ 《敬告同乡书》,《孙中山选集》,第60页。

㉑㉒ 《军政府宣言》,《孙中山选集》第78、77页。

㉓㉔ 《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孙中山选集》第68页;第69页。

㉕ 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略》第24页(商务印书馆1945年版)。

㉖㉗㉘㉙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上的演说》,《孙中山选集》,第80—81页;第82页;第72页。

㉚ 汪精卫:《民族的国民》,《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95页。

㉛ 吴稚:《暗杀时代》,《民报》增刊《天讨》。

㉜ 《咄! 满汉两种族大争讼》,《江苏》,第4期,记事,本省进评,第120页。

㉝ 章太炎:《驳黄兴主张南都电》,载《太炎最近文录》。

㉞ 《建国方略》,《孙中山选集》第195页。

㉟ 戴季陶:《中国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第13—14页。

㊱ 章士钊:《读〈革命军〉》,《江苏》,1903年6月9日。

㊲ 民:《伸论民族、民权、社会三主义之异同再答来书。论〈新世纪〉发刊之趣意》,《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卷2,第1005页。

(责任编辑:陈 志)